

金中都与金代文学的盛世风貌

张勇耀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 迁都北京开启了金朝盛世,也是北京文学史由“地域文学”转化为“帝都文学”的开端。依托于不断完善的政治制度、爱好汉文化和汉语文学的帝王、学养深厚的朝廷文官和往来参加科举考试的四方文士,中都由地理空间转化为多族文人交融互动的文学空间。宫阙、市井、寺院、桥梁等成为文人的书写对象,文人书写也在塑造着这些空间。文人对雪、牡丹、荷花的问题集咏折射着金朝盛世,中都空间又使文人创作呈现出典雅平和的盛世风貌。中都作家以及他们的创作实践和文学思想,对南渡文坛和元初文坛具有启幕意义。

关键词: 金中都;盛世书写;文学空间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2024)05-0104-13

收稿日期: 2024-07-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3AZW014):民族融合与文化重建视阈下的金元之际文学演进研究。

作者简介: 张勇耀(1972-),女,山西文水人,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4.05.001

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金朝迁都燕京(今北京),“以燕乃列国之名,不当为京师号,遂改为中都”^①。这是金朝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重大贡献之一。这一举措不但对于以汉族、女真族、契丹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深度融合具有积极意义,而且为后来元、明、清三朝都以北京作为都城拉开了帷幕。贞元迁都也开启了元好问所说“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午除夜》)^②的金朝盛世。实际上,“五十年”只是概数,从贞元元年(1153)迁都到战争骤起的大安三年(1211),中都气象完好的时长约为58年,中间经历了海陵王完颜亮、金世宗完颜雍、金章宗完颜璟、卫绍王完颜永济四代帝王;而到宣宗南渡后中都失陷的贞祐三年(1215),今天的北京城作为金朝都城的历史共计62年。

从地域文学史的角度观照,金中都文学也是北京文学史上具有开端意义的里程碑。金代之前的“北京文学史”,更多是“历史上的北京作家”和“古代作家的北京书写”的文学史;辽代以北京为南京,也并非国家的都城,文学的发展相对薄弱;只有到了金代,62年的都城史,帝王及政府机构所在地,科举考试制度和国学、太学等教育机构,都使这里成为汇聚淮河以北所有北方区域精英作家的核心区域,北京的地理空间也成为帝都文学空间。学者认为,北京文学史的分水岭在元代建都北京之后,随着1272年北京成为帝都,“元代也以此成为北京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分水岭,成为从‘泛北京’的地域文化嬗变为‘首都’文化的一个鲜明界限,从此北京文学从‘北京地域文学’而转变为‘国家帝都文学’”^③。这种说法应该说是不够确切的。北京作为帝都的文学应该开始于贞元元年(1153),影响所及,不但包括金朝南渡后的汴京文学,而且包括元朝建立后的大都文学。此前学界对金中都和金代中都文学的研究,或征引金诗以说明金中都的地理

①[元]脱脱等撰:《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上·中都路》,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613页。以下版本同此。

②[元]元好问撰,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册,第701页。

③傅秋爽主编:《北京文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4页。

遗迹和历史兴衰^①，或梳理中都时期的主要作家及其创作特征^②，而对中都文化空间为文学带来的盛世气象关注不多，因而尚有继续考察的必要。

一、从地理空间到文学空间

开启中都盛世的首位帝王是海陵王完颜亮。经历了太祖、太宗、熙宗的三代建设，到完颜亮时代，各项制度已渐趋完善，尤其金熙宗重视文治，为女真族的汉化与多民族的融合奠定了重要基础。但迁都举措及完颜亮的系列改革，仍然是金朝历史的重大转折。完颜亮被世宗篡位又被部下杀死后，世宗不但贬其为庶人，谥曰“炀”，还专门收集他的黑材料，“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得美仕”（元好问《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③，导致《金史》多录其秽史。但金元之际士人对此似乎并不以为意，在金亡后的家国回望中，他们更多想到的是完颜亮的英锐有志和文治有为。如元好问写到了海陵王时期教育制度之优和国力之富，“近代皇统、正隆以来，学校之制，京师有太学、国子学，县官饬廩生徒常不下数百人”，“文治既洽，乡校家塾弦诵之音相闻”（《寿阳县学记》）^④；又将海陵王在位的天德年间称为“天德小康之际”，与金世宗的“大定承平之时”并列（《忻州修学疏代郝侯作》）^⑤。刘祁金亡后作《归潜志》也以海陵王开篇，称赞其“读书有文才”，引其藩王时期书扇诗“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证明“人知其有大志”；又引完颜亮南征至维扬时所作“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二句，称道“其意气亦不浅”^⑥。在《辩亡》一文对金朝帝王的追责中，刘祁对完颜亮的评价也以称赞居多，说“至海陵庶人，虽淫暴自强，然英锐有大志，定官制、律令皆可观。又擢用人才，将混一天下，功虽不成，其强至矣”^⑦。学者认为，“金末士人刘祁回想金代文化的繁盛时，第一个怀想起海陵王也是符合历史真实的”^⑧。

迁都燕京正是完颜亮“英锐有大志”的重要表现。因为相比于远在东北的上京会宁府，中都有着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多重优势。朝臣建议海陵王迁都的理由之一，就是上京僻远，“官艰于转漕，民难于赴诉，不若徙燕，以应天地之中”^⑨。尚“中”是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传统观念，涉及地理、政治、民族等多方面的复杂内涵。喜“延接儒生”又“嗜习经史”^⑩的完颜亮自然对“应天地之中”心领神会，何况燕京在地理位置上确实易于管理中原。于是在天德三年（1151）所下的《议迁都燕京诏》中他说：“眷惟全燕，实为要会，将因宫庙而创官府之署，广阡陌以展西南之域，勿惮暂时之艰，以就得中之制。”^⑪他鼓励官民为了

①如曹子西主编，于光度、常润华撰：《北京通史·金代卷》，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侯仁之、金涛：《北京史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朱祖希：《元代及元代以前北京城市形态与功能演变》，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

②对于以“大定明昌”为核心时段的金中期诗坛的特点与风貌，杨忠谦《政权对立与文化融合：金代中期诗坛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一书有较为充分的考论，另有2020年内蒙古民族大学魏华倩硕士学位论文《金代中都文学活动与文学风尚》对金代中都主要作家和一些家族的文学活动、文学风尚等进行了一些考察，但对于中都空间作用于文学而形成的文学风貌，尚未作专门论述。

③[元]元好问撰，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下册，第1280页。

④[元]元好问撰，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中册，第786-787页。

⑤[元]元好问撰，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下册，第1502页。

⑥[元]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

⑦[元]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十二，第136页。

⑧王耘：《金代从地域到国家的政治文化认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51页。

⑨[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625页。

⑩[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二十五《宣宗皇帝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5、187页。

⑪[清]张金吾编撰：《金文最》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59页。

“得中之制”，不要害怕一时的艰难。他又对臣下说：“顾此析津之分，特为舆地之中。”^①地理位置上的“中”是燕京作为都城的表层概念，政治正统之“中”却是一个朝野上下心照不宣的深层文化体系。于是从扩建燕京城到迁都得到了举国上下官民的拥护，建城时“天下乐然趋之”^②，不到两年就基本完成了扩建工程。贞元元年（1153）三月驾幸中都，导引曲中有“銮舆顺动，嘉气满神京，辇路宿尘清”，“都人望幸倾尧日，鰲抃溢欢声。临观八极辰居正，寰宇庆升平”^③等语，可以看出这一举措顺应民心，这也应该是贞元迁都后中都最早的颂圣作品。

中都都是一个地理空间，又是士人商贾争相趋附的实体空间，对文人来说则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空间。迁都初期盈满京城的盛世气象，也对文学风貌形成了重要影响。世宗时名臣梁襄对中都城的地理空间有过生动描述，他称中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又有“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都畿，易于据守”，认为这正是“皇天本以限中外、开大金万世之基而设也”^④。梁襄对于中都北倚山险、南控区夏的地理优势，以及金朝在此定都若干年后“宫阙井邑之繁丽，仓府武库之充实”的现状予以生动描述，正是中都盛世气象和文人盛世心态的折射。

中都形制仿照北宋汴京，主持营建的张浩、孔彦舟等还派人到汴京进行了测绘^⑤。清人说“燕京宫阙壮丽，延亘阡陌，上切霄汉，虽秦阿房、汉建章不过如是”^⑥，虽不免有夸张，但其雄丽可见一斑。完颜亮迁都后，对中都城宫室苑囿进行了重新命名，“多取仙都、城阙、宫殿、池岛之号”，如将辽之瑶池改名为太液池，又命名了诸如芙蓉池、十洲三岛等，“凡花木之可珍者，易以琪树、珠树，建木瑞华、琼蕊、瑶草、朱英、紫脱之名”^⑦。世宗即位后崇尚节俭，对完颜亮的奢华铺排、耗费民力极为不满，“多易其殿阁池馆各类，存其旧名者十无一二”^⑧。尽管如此，世宗、章宗两朝无疑都在继承和享用着完颜亮所创制的京都文化空间，以及完颜亮重视文治的发展之路，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中都宫阙殿阁的崔嵬壮丽以及宫殿内外景观风物的精致美好，使这一时期的中都书写呈现出青春朝气与盎然生机，洋溢着勃发向上的精神风调。

皇家宫阙是一个特殊的文学空间。金章宗完颜璟有一首《宫中绝句》，写到他在一个朝霞满天的清晨所看到的“三十六宫”：“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扬花。”^⑨在这位少年天子眼中，朝霞万丈，五色祥云浮金泛碧，映照烘托着楼阁峥嵘的皇宫。放眼望去，晨光中的各座宫殿全都卷起了门帘，准备迎接新的一天；而此时春风吹拂，杨花柳絮无处不飞。诗歌写得青春朝气，色彩富艳，格调明丽。诗中的“三十六宫”暗用班固《西都赋》“离宫别馆，三十六所”、唐代骆宾王《帝都篇》“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典故，突出了朝廷宫阙之多。末句也暗含了唐人韩翃《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之典，既体现了这位女真帝王对汉诗典故的熟练运用，又在不动声色中将汉唐宫阙气象寓于诗中，难怪刘祁评价此诗“真帝王诗也”^⑩。

大定十九年（1179）世宗在中都城北修建离宫，原名太宁宫，后更名为寿宁宫、寿安宫，章宗明昌二年

①[清]张金吾编：《金文最》卷二，第59页。

②[元]脱脱等撰：《金史》卷八十三《张浩传》，第1981页。

③[元]脱脱等撰：《金史》卷四十《乐下》，第985页。

④[元]脱脱等撰：《金史》卷九十六《梁襄传》，第2262-2263页。

⑤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44引张棣《金虏图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751页：“遣画工写京师（指汴京）宫室制度，至于阔狭修短，曲尽其数，授之左相张浩辈，按图以修之。城之四围九里有三十步，自天津桥之北曰宣阳门，如京师朱雀门。”

⑥[清]于敏中等：《钦定四库全书》卷二十九引《海陵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21页。

⑦[元]耶律铸：《琼林园赋》文中夹注，《全元文》，第4册，第14页。

⑧[元]耶律铸：《琼林园赋》文中夹注，《全元文》，第4册，第14页。

⑨薛瑞兆编撰：《新编全金诗》，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1册，第418页。

⑩[元]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一，第3页。

(1191) 更名为万宁宫^①，即今北京琼华岛。万宁宫是帝王游宴避暑之所，扈从章宗驻蹕万宁宫无疑是文人的荣幸。如泰和四年（1204）正月，赵秉文扈从春水，三月驻蹕万宁宫，作《扈蹕万宁宫》五首，其一云：“一声清蹕九天开，白日雷霆引仗来。花萼夹城通禁籞，曲江两岸尽楼台。柳阴罅日迎雕辇，荷气分香入寿杯。遥想薰风临水殿，五弦声里阜民财。”^②诗歌描绘了章宗春水途中驻蹕万宁宫的浩大气势：君王令下，九天顿开，白日响雷；花萼直通万宁宫下，楼台遍立江水两岸。在三、四两联中，万宁宫本身的特点被遮蔽了，植物们纷纷跳到前台迎驾，花萼夹城，绿柳成荫，荷花飘香，无不在为帝王的抵达欢呼雀跃，向帝王称觞祝寿。末二句还将章宗的春水之行与宋徽宗在临水殿举行宏大庆典仪式的耗竭民财相对比，突出了章宗春水不费民财的特点。这样毫无保留的借物颂上，正是这一时期中都盛世文学的特质之一。

宫阙之外，中都市井也呈现着文学的繁荣。经过历代帝王的相继经营，中都歌舞楼馆林立，各种名目的楼馆成为文学活动的场所和文学书写的内容，如状元楼、长生楼、梳洗楼、应天楼、披云楼等，元初遗址仍存^③。状元楼应该是以进京考试的学子为主要营业对象的商业场所，考试结束后，新科进士也往往会在这里举行一些私人庆祝活动。世宗、章宗时期的名臣张大节，承安二年（1197）曾在状元楼参加了吕造等新科进士的宴集活动，作有《同新进士吕子成辈宴集状元楼》诗：“鸚鵡新班宴杏园，不妨老鹤也乘轩。龙津桥上黄金榜，三见门生是状元。”^④作为与科举、仕途密切相关的文化空间，状元楼是中都城内备受文人瞩目的宴聚场所。“好奖进士类”^⑤的张大节第三次看到门生成为状元，诗中颇有自得之意。

燕市是中都著名的文化空间，金亡后杨弘道返回中都，凭吊古迹云：“海日西沉燕市晚，寒鸿南度蓟门秋。”（《中都二首》）^⑥《北京通史》据此“可证‘燕市’‘蓟门’均在中都城内”^⑦。燕市活动着大量中下层文人，如“有司荐其才，以嗜酒不果”的平凉（今属甘肃）人师拓，作有《燕市酒楼》诗，元好问摘其“气清天旷荡，露白野苍凉”等句，说此类诗句“大为时人所称”^⑧。师拓人生失意，在繁华的燕市酒楼放眼窗外，却看到气清天旷、露白野凉，这与中都的文化氛围有关。燕市也是中都文士的交际空间，师拓《赠云中刘巨济》写到“绿绮音谁会，青霄气自干。那知燕市里，把酒得交欢”^⑨。科第不捷，仕路不达，知音稀少，深感居京不易的失意诗人于中都秋寒的燕市中结交到了真挚的友人，令他感受到了帝都的温情。“尚奇派”诗人张穀更是经常在燕市饮酒，其《醉后》诗云：“日日饮燕市，人人识张胡。西山晚来好，饮酒不下驴。”^⑩燕市之繁华与文人对此地的钟情可见一斑。中都名流李纯甫也经常与同道文士宴聚于燕市，如大安元年（1209）李经再度下第决定回乡时，李纯甫《送李经》诗写到他与张穀、周嗣明、李经等人的诗坛竞赛，说“瑰奇天下士”李经“笔头风雨三千字，醉倒谪仙元不死，时借奇兵攻二子”，也即张穀、周嗣明都不是他的对手。几人也常常“纵饮高歌燕市中，相视一笑生春风”^⑪，诗人的诗酒之乐、快意人生都在燕市得以呈现。

中都寺庙林立，因而也是一个佛教文化空间。帝王常将佛寺作为祈雨祈福和接见大臣之所，还曾在此选试进士。如存世至今的北京法源寺，始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于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建成，

①[元]脱脱等撰：《金史》卷九《章宗纪一》，第238页。

②[金]赵秉文撰，马振君整理：《赵秉文集》卷七，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8页。

③曹子西主编，于光度，常润华撰：《北京通史·金代卷》，第241页。

④[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7册，第2137页。

⑤[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7册，第2135页。

⑥李俊民、杨奂、杨弘道撰，魏崇武等校点：《李俊民集·杨奂集·杨弘道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445页。

⑦曹子西主编，于光度，常润华撰：《北京通史·金代卷》，第242页。

⑧[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3册，第1054页。

⑨[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3册，第1066页。

⑩[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7册，第2157页。

⑪[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3册，第1127-1128页。

命名为悯忠寺，后安禄山和史思明分别在寺的东南和西南各建了一座木塔。大定十三年（1173）八月，金世宗在此试女真进士科，后官至左丞的徒单镒及其他二十六人中选。此年悯忠寺双塔竟有异瑞，“进士入院之夜半，闻东塔上有声如音乐，西入宫”，考官完颜蒲涅等人说：“文路始开而有此，得贤之祥也。”^①成为中都佳话。中都文人也相约登临悯忠寺阁，赋诗抒怀。赵秉文有《陪李舜咨登悯忠寺阁》，看到“云山浮近甸，宇宙有高楼。鸟外余残照，天边更去舟”^②，充满禅思佛趣。又明昌二年（1191）进士史肃有《登悯忠寺阁》诗：“净宇怀超想，层梯企俊游。喧卑三界尽，制作六丁愁。聚土闲童子，移山老比丘。能除分外见，寸木即岑楼。”^③史肃喜好佛学，是李纯甫进入佛学的领路人，诗歌融汇着他的佛学见解，登寺阁而远观，生出“三界”“六丁”之类的超迈之想。这是中都佛教空间给予文人的另类感怀，诗歌也呈现出与金朝盛世相适应的典雅闲适风貌。

中都帝王还就寺庙设行宫。如辽代曾于今北京西北郊的香山建香山寺、安集寺，金世宗于大定二十六年（1286）重修，合二寺为一，改名为大永安寺，并设行宫于此。赵秉文有《香山》诗：“山秀薰人欲破斋，临行别语更徘徊。笔头滴下烟岚句，知是香山境里来。”^④又《香山飞泉亭》：“霜风吹林林叶干，泉声落石毛骨寒。道人清晓倚栏干，自汲清泉扫红叶，一庵冬住白云端。”^⑤二诗颇可见出他对佛教境界的领会和对僧人生活的体悟。周昂也有《香山》诗：“山林朝市两茫然，红叶黄花自一川。野水趁人如有约，长松阅世不知年。千篇未暇偿诗债，一饭聊从结净缘。欲问安心心已了，手书谁识是生前。”^⑥由周昂诗可知，当时的香山不但有红叶，还有菊花和松树。周昂在香山寺用斋，产生了“结净缘”之想；而此处连通着市朝和山林，也让周昂产生了关于人生仕隐的思考。这是文人与中都佛教空间的精神交会，这些书写也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中都的盛世景象。

中都有天津桥，《大金国志·燕京制度》：“城之四围凡九里三十步，自天津桥之北曰宣阳门……”^⑦也成为文人的游息之所。诗人们享受着帝都的空间，也享受着帝都的月夜。知交同游，用诗歌书写着他们眼中的美景和心底的盛世。大定二十八年（1188）进士高廷玉曾与李纯甫在天津桥待月，作《天津桥同李之纯待月一首》：“骖鸾追散仙，乘槎抵银潢。跳上玉龙背，抱得银蟾光。素娥愁不归，再拜捧瑶觞。问以天上事，玉色俨以庄。尔能为我歌白雪，我亦为尔捣玄霜。不然借我广寒殿，与我长作无何乡。傍有谪仙人，拍手笑我狂。天风忽吹散，人月两茫茫。”^⑧高廷玉在当时极富盛名，“章宗、卫王朝甚有时名，为人豪爽尚气节，一时名士多归之”^⑨。李纯甫与之意气相投，评价他是“真济世材”，“学术端正，可以为吾道砥柱”^⑩。此诗写得生动雅致，在与月亮的商讨对话中兴味盎然；他甚至想象自己的狂妄会遭到爱月的李白的嘲笑，趣味又增一重。诗末幻想中的景致忽然被风吹散，诗人也被拉回到现实。诗歌色彩由亮到暗，节奏由喧到静，突然而至的沉思，好像天津桥正连通着天空与地面、幻境与现实。高廷玉之诗，刘祁家中曾藏有十几首，后经丧乱，丢失不存，刘祁只记得其《中秋诗》中二句“跳上玉龙背，抱得银蟾光”，认为“亦奇语也”^⑪，所引二句即出自《天津桥同李之纯待月一首》。

①[元]脱脱等撰：《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第1221页。

②[金]赵秉文撰，马振君整理：《赵秉文集》卷六，第144页。

③[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4册，第1193页。

④[金]赵秉文撰，马振君整理：《赵秉文集》卷八，第224页。

⑤[金]赵秉文撰，马振君整理：《赵秉文集》卷三，第51页。

⑥[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2册，第867-868页。

⑦[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三十三《地理》，第470页。

⑧[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4册，第1301页。

⑨[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4册，第1300页。

⑩[元]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四，第33页。

⑪[元]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四，第33页。

中都有卢沟桥，起修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修成于章宗明昌三年（1192）。桥修成后，不但避免了行人通航的危险，也成为人们出入中都的交通要道。赵秉文曾送人出京，作有《卢沟》诗一首：“河分桥柱如瓜蔓，路入都门似犬牙。落日卢沟沟上柳，送人几度出京华。”^①那是金朝气象完好的时期，他看到桥柱倒映在水中，像瓜蔓一样蜿蜒曲折。通过卢沟桥进京出京的人络绎不绝。进京者过桥入都门，会看到都城街衢四通八达、犬牙交错；出京者过桥出都门，桥两边的柳树一回回在落日余晖下目送行人依依惜别。

总之，中都大大小小的空间涵容着文人们的才情意趣，触发着他们的诗词创作，也为他们提供了交际的场所。而世宗、章宗时的养士政策和宽松的文化氛围，又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章宗时“一时名士辈出。……政令修举，文治烂然，金朝之盛极矣”^②的局面。

二、多族文人群体与科举、太学的作家培养

中都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建都后成为金王朝东北大后方与黄河以北原北宋地区之间的枢纽地带，也成为东北、中原地区贸易往来的集散地，汉、女真、蒙古、契丹、奚、渤海等族人民往来其中，日益繁盛。贞元迁都进一步推动了中都城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如学者所说，从世宗大定到章宗承安的四十年间，“金朝从女真族到各族人都经历了政治和文化认同的转变”，“金朝成为金朝人的金朝，金文化成为北方各族人所认同的文化形态”^③。中都时期，多族士人共居一城，交游唱和，形成了标识性鲜明的文学群体，

中都官僚体系中民族融合的典范无疑是女真宰相完颜守贞（号冷岩）与其门人形成的多族文化圈，门人中优秀者号为“冷岩十俊”。金亡后刘祁说由故老处听闻“女直宰相中最贤者曰完颜守贞”，“屡正言，有重望”，“接援士流，一时名士如路侍御铎、周户部德卿诸公皆倚以为重”^④，所列路铎、周昂都是汉族文人；《金史》本传也说完颜守贞“喜推毂善类，接援后进，朝廷正人多出入门下”^⑤。明昌三年（1192），完颜守贞由于受章宗猜忌自请解职，以尚书左丞出知东平府事，离开中都时，周昂、刘中都有诗送行。周昂《冷岩行赋冷岩相公所居》诗云：“涧之毛，可筐筥。山之木，可斤斧。惟有白云高崔巍，风吹不消自太古。岷山何奇？羊子所攀；东山何秀？谢公往还。”^⑥以《诗经·考槃》的涧阿之喻及羊祜、谢灵运使岷山、东山因人而名的典故，慰勉完颜守贞享受自然山水之乐，说他所居的山水会因他的德望而声名显赫。刘中《冷岩公柳溪》末二句则云：“人间桃李栽培满，换得溪南十亩阴。”^⑦“桃李”之喻表达了对完颜守贞推奖造育人才的感念之情。初入仕途的赵秉文首次被贬出京师也是因为“上书论宰相胥持国当罢，宗室守贞可大用”^⑧。完颜守贞出治东平期间，右丞刘玮对金章宗说：“方今人材无出守贞者，淹留于外，诚可惜也。”^⑨中都的政治文化空间促进了民族融合，女真贵族与汉人文士中的“清流”形成了相互推奖、惺惺相惜的局面。

当然尤为重要的是中都帝王的科举改革，为金源一代学人文士登上仕途与文坛开通了道路。金朝自太宗天会元年（1123）因辽、宋旧制开设科举，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完颜亮天德三年

①[金]赵秉文撰，马振君整理：《赵秉文集》卷八，第213页。

②[元]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十二，第136页。

③王耘：《金代从地域到国家的政治文化认同》，第16-17页。

④[元]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十，第112页。

⑤[元]脱脱等撰：《金史》卷七十三《完颜守贞传》，第1794页。

⑥[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3册，第869页。

⑦[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3册，第1019页。

⑧[元]脱脱等撰：《金史》卷一一〇《赵秉文传》，第2564页。

⑨[元]脱脱等撰：《金史》卷七十三《完颜守贞传》，第1792页。

(1151) 罢“南北选”和经义、策试二科，专以词赋取士，废止“经童”科^①，增加殿试。罢南北选缩小了南北差距，促进了民族融合；增加殿试强化了赴试文人的荣誉感，正隆二年（1157）即有文人说：“皇帝临轩赋业，见贤焉，然后用之，诚夸越复古之制也。”（李杲《京兆府重修府学碑》）^②就在天德三年，金代文学史上卓具盛名且有作品传世的蔡珪、刘汲、王寂、边元鼎、刘瞻、王元节、乔宸、郑子聃、雷思、王邦用、张大节等人进士及第，登上政坛也登上了文坛。

由薛瑞兆先生《新编全金诗》对诗人生平的考证统计可知，从海陵王迁都后的贞元二年（1154）第一次举行殿试到卫绍王崇庆二年（1212）最后一次开科（贞祐二年因迁都未举行殿试），中都共举行科举 20 次，金代中后期不少影响巨大的作家都在这一时期进士及第，其中有诗歌传世的著名诗人就有 130 余位。为便于直观了解作家及第情况，列表如下：

帝王	榜次	及第作家
海陵王时期	贞元二年（1154）	赵安时、张汝霖、赵可、武明甫
	正隆二年（1157）	刘仲尹、冯子翼、王启、高公振、张万公、郝俟
	正隆五年（1160）	路伯达、王遵古、李愈
世宗时期	大定三年（1163）	孟宗献、郑辉、梁襄、周伯禄、高德裔、高有邻、耶律履
	大定七年（1167）	卢启臣、郭用中、靳子昭、赵撝、许安仁
	大定十年（1170）	李献可、党怀英、贾益谦
	大定十三年（1173）	刘迎、赵承元、孙铎
	大定十六年（1176）	毛麾、王庭筠、赵之杰、赵鼎、梁璫
	大定十九年（1179）	张华、李楫、李仲略、刘昂（之昂）、田特秀、张行简、高汝砺
	大定二十二年（1182）	赵沔、周昂、杨庭秀、赵文昌、路元、萧贡
	大定二十五年（1185）	宗端修、路铎、赵秉文、崔遵
	大定二十八年（1188）	朱澜、卢元、卢庸、张翰、张穀、史公奕、张行信
章宗时期	明昌二年（1191）	韩玉、史肃、宋元吉、李好复、赵文昌、刘涛、翟升、吕子羽、李通
	明昌五年（1193）	刘中、张邦彦、张樾、梁仲新、田琢、庞铸、王扩、吕卿云、赵伯成、杨云翼、许古、陈规、赵思文
	承安二年（1197）	赵述、王礪、王宾、刘光谦、刁白、卢洵、李著、李纯甫、孙镇、孙铸、李芳、冯延登、冯璧、李节、王若虚、吴章
	承安五年（1200）	阎长言、刘昂（次霄）、贾炤、王仲元、王良臣（大用）、卫承庆、刘铎、杨慥、石抹世勳、刘祖谦、路忱、卢天锡、董文甫、王彧、苑中、李国栋、李俊民
	泰和三年（1203）	高宪、王特起、毛端卿、惠吉、张琚、张正伦、李献卿、张特立
	泰和六年（1206）	郾掖、梁持胜
卫绍王时期	大安元年（1209）	张穀英、刘从益、王纲、张敏修、乐著
	崇庆二年（1212）	雷渊、康锡、马天采、宋九嘉、冀禹锡、张邦直、王楫

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考察，中都 20 次科举所积聚的人才，有一些在中都时期熠熠生辉，如党怀英、刘迎、赵沔、王庭筠、周昂等；有一些成长为南渡后影响一代的名臣巨擘，如赵秉文、杨云翼、李纯甫、刘从益、雷渊、宋九嘉等；还有一些成为元初文学的开篇人物，如冯璧、王若虚、吴章、李俊民、张特立等。而赵秉文虽在金末围城去世，他的文学思想和风格却通过元好问及其弟子郝经等人，对元代文学发生了重要影响。统计中我们还看到，中都进士诗人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家族化倾向，如完颜亮时期及第的王遵古、冯子翼、路伯达、赵可分别为后来及第的王庭筠、冯璧、路铎、赵述的父亲，刘仲尹则是南渡后及第的进士诗

①[元]脱脱等撰：《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一》，第 1221 页。

②[清]张金吾编撰：《金文最》卷六十七，第 974 页。

人李献能的外祖父；世宗时期及第的梁襄、许安仁、贾益谦、周伯禄分别为后来及第的梁持胜、许古、贾瓘、周昂的父亲，张行简、张行信为兄弟，卢启臣与卢元、卢庸为父子，高公振、李仲略、朱澜分别为迁都前即进入官僚体系的诗人高士谈、李晏、朱之才之子，而元好问的两任岳父张翰、毛端卿也在中都先后及第，等等。这些文学才士经过科举的通道会聚中都，并以中都为中轴向外流动，无疑为中都 60 余年的文学繁荣带来了鲜活的生命力和蓬勃的创造力。

此外，中都教育机构也为金代文学积聚了大批人才，促进了文学代群的形成。

在帝王们的相继经营下，中都教育机构逐步完善，据考证有国子监、国子学、太学、女真国子学、女真太学、大兴府府学、大兴府女真府学等^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都太学，它不仅拥有大量古今图书，学生也都是精通一经以上又能吟诗作赋的青少年才士。据《中州集》《归潜志》等文献统计，曾入中都太学并有作品传世的作家共有 25 人。其中明确记载进士及第者有 14 人，分别为崔遵、赵伯成、冯璧、高宪、刘从益、雷渊、周驰、马天采、宋九嘉、梁持胜、冀禹锡、申万全、刘微、王渥，还有魏璠、麻九畴恩赐及第，占到了总数的 64%。未及第者共有 8 人，张穀、李经、冯志亨都是两试不第而放弃科举，郝天挺、刘勋、马肩龙是因为南渡前后国乱决意不再走科第之路，孙邦杰因卷入高廷玉“勤王案”而隐姓埋名并遁入黄冠（元好问《孙伯英墓铭》）^②，宋子贞则于南渡后逃难入宋未参加汴京科举。也就是说，太学作为通过科举入仕的“预科班”，及第或被赐第的几率非常之大。

作为一个实体空间，太学为这些青少年才士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25 人中在太学“有赋声”或“有词赋声”的就有冯璧、崔遵、马肩龙、宋九嘉、李经、王渥六人，太学声誉为他们以后的文学成就奠定了基础。如高宪“年未三十，作诗已数千首”^③；刘勋虽未及第，但“南渡后专于诗学，往往为人所传”^④。太学也为像雷渊、马天采这样的贫困学子提供了学习和生活的场所。《归潜志》记载雷渊“以孤童入太学，读书昼夜不休。虽贫甚，不以介意”^⑤；《中州集》记载马天采“住太学十九年，贫苦之极，人所不能堪，然其谈笑自若也”^⑥。太学还使这些少年才士结下了一生的情谊，如刘祁说申万全“在太学，与雷丈希颜及余先君（刘从益）同舍相善，先君尝称其为人”^⑦；刘从益与同乡也雷渊保持了一生的情谊，刘从益去世后，雷渊《刘御史云卿挽词二首》其二中有“乡校联裾春诵学，上庠连榻夜论心”^⑧之句，“上庠”即指中都太学。

由于身在中都国家教育机构，太学生的文学才华也很容易得到朝廷文学大家的认可与推扬。少年刘从益在太学作“黄金错落云间阙，红粉高低柳外墙”二句，“时辈皆推服之”^⑨，这种群体性的确认和推扬也成为诗人日后文学成就的基石。而与当时文坛名士的结识与交游，则使这些太学生获得了一般少年难得的机遇。如在太学期间，孙伯英“所与游皆一时名士”^⑩；冯璧“雅为闲闲公所激赏”^⑪；麻九畴在太学刻苦自励，“为赵闲闲、李屏山所知”^⑫，等等。名人的鼓励、激赏既有助于诗学水平的提高，也有助于日后仕途与文学之路的通达，如赵秉文南渡后主持科举，便打破常规选拔了麻九畴。好奖掖后学的李纯甫更是由于对这些青年后进的推奖，形成了以他为中心，以雷渊、李经、宋九嘉、张穀、梁持胜等人为代表的“尚奇派”。如

①曹子西主编，于光度，常润华撰：《北京通史·金代卷》，第 248-251 页。

②[元]元好问撰，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上册，第 193 页。

③[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 4 册，第 1343 页。

④[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 6 册，第 1895 页。

⑤[元]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一，第 9 页。

⑥[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 6 册，第 1924 页。

⑦[元]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五，第 45 页。

⑧[元]刘祁撰，崔文印点校：《中州集校注》，第 5 册，第 1719 页。

⑨[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 5 册，第 1612 页。

⑩[元]元好问撰，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上册，第 192 页。

⑪[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 5 册，第 1459 页。

⑫[元]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二，第 14 页。

《归潜志》的几条记载：

（宋九嘉）少游太学，有词赋声。从屏山游，读书、为文有奇气，与雷希颜、李天英相埒也。

（李经）入太学肄业，屏山见其诗曰：“真今世太白也。”盛称诸公间，由是名大震。

（张穀）初入太学，有声。从屏山游，与雷、李诸君及余先子善。

（梁持胜）少游太学有声。为人多膂力，尚气节，慨然有取功名志。屏山诸公皆壮之，尤与雷希颜善。文章豪放，有作者风。^①

太学是中都政治文化空间中一个具体的空间，它不但具有内部的自为环境，更与外部的朝廷文官体系、赴试中都的四方文人发生着关联。正是因为进入太学，李经、宋九嘉、张穀、梁持胜的豪杰禀赋与尚奇文学特征得到了李纯甫、雷渊的赏识。由他们与太学的渊源也可考知，尚奇派诗人群体的形成是在南渡前以中都太学为中心的文学空间中，李经、梁持胜去世于南渡之前，李纯甫、雷渊、宋九嘉、张穀等人则把这一诗风带到了南渡之后。

三、中都文人的典雅生活与盛世书写

中都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积聚着大量通经籍、能诗文的文人才士，中都为他们的文学活动提供了特定场所，盛世风貌又使他们的中都书写呈现出雅致闲适的特征^②。作为文学空间的帝都景观给文人们带来新奇愉悦的审美感受，由此形成的中都书写格调明丽、情感欢快，也使中国文学中一些传统意象生出别具一格的生命力。而此类书写也与中都盛世气象相适应，或多或少地带有应制颂圣气息。

帝都冬雪总是能为碧瓦红墙、高低错落的皇家宫阙带来别样的观感，当这种观感与国家政治经济的上升气象相融汇，自然景观便被附着了超出自然本身的文化意蕴，涵育着饱满淋漓的情感元素，成为中都诗坛盛世图景的写真。

海陵王正隆五年（1160）十二月，一场大雪降落中都，正隆二年（1157）进士任询在所作的《庚辰十二月十九日雪》中，描绘了京城大雪与宫廷场景，并将这种自然物候与政治气象相联系。诗云：

冯夷掬水翻银玃，北风浩浩如兵威。琼台玉榭压金碧，三十六宫明月辉。五更待漏鸡人唱，近卫牖传九天上。须臾龙驭踏飞瑶，万户千门寂相向。皓齿才人宫袖窄，巧画长眉梅半额。含嚙一笑竞春妍，绣勒锦鞯生羽翮。城外雪深回马首，别殿传觞灯作昼。欢声一曲借春谣，半夜西园满花柳。霏濡已见盈阡陌，况是隆冬见三白。帝力如天人得知，今庆明年好春泽。^③

任询是金代著名画家，“为人慷慨多大节。书法为当时第一，画亦入妙品。评者谓画高于书，书高于诗，诗高于文”^④。在画、书、诗、文四艺中，诗排在他成就的第三位。正因为能书善画，他的诗歌呈现出极强的流动感与画面感。诗歌写到，迁都七年之后的一个冬日清晨，诗人站在上朝的队列之中，感受一场冬雪带来的京师盛景。在诗人看来，雪粒洒落，如同水神翻浪；北风呼啸，就像在展示兵威。金碧辉煌的帝王宫阙被白雪覆盖，变成了琼台玉榭；四字清寒冷冽，鳞次栉比的宫殿正沐浴在明月的辉光之中。随着晨鸡啼明、近侍传牖，帝王骑着装饰华丽的雄骏大马出现在雪地上，就好像飞鸟一样迅捷矫健；而帝城宫殿的万户千门都在屏息等待着帝王的出场。“皓齿”以下几句，以纷丽的色彩和鲜活的动感打破了刚才的庄严肃静，以妃嫔们的欢喜侧面映衬着这场大雪所带来的宫廷之乐。末二句将自然之雪与帝力相关联，凸显了宫体诗的颂圣主题。迁都初期的中都宫观与这位画家诗人色彩纷呈、景观错落、动静交织的精妙书写相结

①[元]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二、卷五，分见第11、12、12、48页。

②参看杨忠谦：《政权对立与文化融合：金代中期诗坛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③[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2册，第432页。

④[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2册，第427页。

合，使中都城呈现出万象皆新的宏大气魄。

其实海陵王完颜亮也是写雪高手。他有一首《昭君怨·雪》词广受称道：

昨日樵村渔浦，今日琼州银渚。山色卷帘看，老峰峦。锦帐美人贪睡，不觉天孙翦水。惊问是杨花，是芦花？^①

此词极富生活气息，写出了雪对于景观的装饰作用和宫廷生活的日常。一场雪将樵村渔浦装饰为琼州小渚，卷帘时所见到的远方峰峦，似在一夜之间变得苍劲老迈。贪睡的美人一觉醒来，看到满天飞花，惊问是杨花呢还是芦花？由于此词生动可爱，被南宋岳珂《桧史》、明人陈霆《渚山堂词话》及清代《历代诗余》《花草粹编》《词综》等多种选本收录。陈霆说收录此词的原因是它与完颜亮其他词相比，显得“和平奇俊”；《历代诗余》则引《艺苑雌黄》评价此词“诡而有致矣”；民国金启华《金词论纲》评价此词“用对照写法，景物如绘”，“老峰峦”的“老”字，“奇想把峰峦写得由颜色变为年龄了”，而末二句“惊问是杨花，是芦花”，则“发问在天真中具有妙语巧比”^②。

中都落雪也成为京师诗人们交游宴饮的契机，因落雪而招饮成为他们公余雅致生活的方式之一。平阳人毛麾为大定十六年（1176）举人，屡试未第，以学行特赐进士出身，授校书郎，入教宫掖，历太常博士。他的《新春雪与韩府推》即趁雪招饮，书写了雪中京官的日常生活：“春到千门气自嘉，更教飞雪助年华。六街官柳枝枝絮，一夜江梅树树花。况是纵吟多伴侣，直须烂醉作生涯。扫庭迎客东风里，幕府风流有故家。”^③诗歌以欢快的笔触描绘这场京师春雪，千门迎春，雪助年华，嘉气满京师，户户有欢声。诗人放眼京城街衢，看到官植的柳树好像在枝枝飘絮，江边的梅花也像在一夜之间开满了白花。张浩主持修建中都时，于“驰道两傍植柳”；世宗大定四年（1164）十月又“命都门外夹道重行植柳各百里”^④，诗歌正反映出京师道旁柳树成行的情况。这样的日子，正适合同僚好友相约欢会，饮酒赏雪，直到烂醉。于是诗人打扫好庭院，做好迎客准备。元人王恽《江神子》词序曾写到金朝的“撒雪”风俗，颇有趣味：“金朝遗风，冬月头雪，令僮辈团取，比明抛亲好家。主人见之，即开宴娱宾，谓之‘撒雪会’。”^⑤由此可见中都落雪为君臣生活所带来的乐趣。

章宗时期的一场冬雪，却被喜欢命题的章宗当成了一道诗题派给文臣，明昌五年（1193）进士杨云翼即应命作《应制雪诗》一首：“阴云破腊不曾晴，瑞雪随风落五更。积玉未平鸱鹄瓦，飞花先满凤皇城。润深农亩千畴绿，尘压龙沙万里清。最好寿杯浮喜色，明年洗眼看升平。”^⑥这场酝酿已久的瑞雪在五更降落，雪薄未满宫墙瓦，帝都城里有飞花。诗人的目光由帝都延伸到城外，似乎看到雪润垄亩，千畴麦田一片葱绿，万里龙沙长势良好。龙沙，麻黄的别名。那么此时帝王也可高举寿杯，满脸喜色，和大臣们一起张望明年的风调雨顺、天下升平。杨云翼作为金代中后期与国事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代文臣，即使是在承平时期的应制诗中，也能将视线落于天下民生，这也是他南渡后能够与赵秉文一起执掌文柄、在汉人文士中受到尊崇赞誉的原因之一。

帝都多花卉，牡丹和莲花似乎受到格外关注。《大金国志》写到大定十七年（1177）四月三日，“帝与太子诸王在东院赏牡丹，晋王允猷赋诗以陈，和诗者十五人”^⑦。这一雅事也被清人津津乐道，陆长春《金宫词》咏其事云：“奏上金花笺一束，侍臣争和牡丹诗。”^⑧可惜晋王与群臣的和诗都没有保存下来。金章宗曾

①唐圭璋编：《全金元词》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6页。

②刘锋焘编：《金元词评注·金词》，西安：西安出版社，2014年，第130页。

③[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6册，第1828页。

④[元]脱脱等撰：《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上·中都路》，第614页。

⑤[元]王恽撰，杨亮、钟彦飞汇校：《王恽全集汇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8册，第3222页。

⑥[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3册，第1110页。

⑦[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十七《世宗皇帝中》，第240页。

⑧[清]陆长春：《辽金元三朝宫词·金宫词》，[元]柯九思等：《辽金元宫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4页。

写有一首《云龙川泰和殿五月牡丹》，他对牡丹的偏爱可见一斑。党怀英有《应制粉红双头牡丹二首》，赵秉文有《五月牡丹应制》一首，应该都是应章宗命题而作。赵诗云：“好事天工养露芽，阳和趁及六龙车。天香护日迎朱辇，国色留春待翠华。谷雨曾霑青帝泽，薰风又卷赤城霞。金槃荐瑞休嗟晚，犹是人间第一花。”^①美景美词加以美典，天下好花开遍都是为了迎接帝王朱辇，谷雨薰风都曾沐浴帝王恩泽；花开得晚一些又有什么关系呢？有了帝王的垂青，开得再晚也还是人间第一花。谀词浮意，点缀升平，这是赵秉文初入政坛与文坛身逢盛世时的文学创作，在他的创作史上只能算作童稚试笔。牡丹也出现在离京文人的诗中，成为京师繁华生活的代表性事物，如蔡珪在送人进京的《和彦及〈牡丹〉》，时方北趋蓟门，情见乎辞》诗中怀念帝都牡丹云：“旧年京国赏春浓，千朵曾开共一丛。好事只今归北圃，知音谁与醉东风。临觞笑我官程远，赋物输君句法工。却笑燕城花更晚，直应趁得马家红。”^②蓟门旧观，千花竞放，如今友人入京，自己却官程遥远，不知何时能再进京。燕城地寒花开晚，应该会等到自己入京吧。

帝都宫廷中有莲池，莲花盛开和宫女采莲成为宫廷诗人眼中的一道美景。大定二十八年（1188）进士朱澜是金初诗人朱之才之子，元好问称其“学问该洽，能世其家”，中进士时已经60岁，然而“意气不少衰”^③。他的《宫词》即写到了这道宫廷景观：“太一芙蓉上下天，秋波澹澹白生烟。采莲宫女分花了，笑把兰篙学刺船。”^④闲适中的诗人看池中芙蓉，看水天相映中秋波澹澹，看采莲宫女笑语嫣然地分头采摘，看她们手持兰桨学着撑船的娇憨之态。对莲的爱好也影响到了文人的日常生活，赵沔写到在盆池中栽植的荷花：“一泓寒碧翫波光，雨后妖红独自芳。不许纤尘污天质，政须清吹发幽香。洛神初试凌波袜，妃子来从礅石汤。休笑埋盆等儿戏，要令引梦水云乡。”^⑤以盆为池栽植荷花并在雨后细细观赏，他联想到了曹植《洛神赋》女神的凌波微步，宋人周敦颐《爱莲说》中的“出淤泥而不染”，对荷花的人格化审美品格进行开掘。末句则向时人辩白此举并非儿戏，而是要通过这盆中之莲带自己到风景清幽的隐者之乡。盆栽荷花之举以及诗人赏莲写莲的雅兴，都折射着金朝盛世文人生活的精致化和典雅化。

赏莲作诗也成为中都文人文学生活的一部分。承安二年（1197）及第的王若虚是周昂的外甥，曾写《西城赏莲呈晦之》诗云：“旧赏回头已隔年，高花又见出新妍。偶成浊酒狂歌会，恰及斜风细雨天。乐事适来偏有兴，闲身常得分无缘。作诗莫怪多夸语，差比放翁先著鞭。”^⑥诗中的“放翁”不是指陆游，而是周昂之侄周嗣明。周嗣明“为人有学，长于议论”^⑦，深得李纯甫喜爱，因他身材短小，李纯甫戏称之为“短周”，为作《真赞》。周嗣明虽无诗文传世，但由李纯甫对他的喜爱称道来看，应该属于奇豪一派。王若虚有《林下四友赞》说他与彭悦、王权、周嗣明相约将来要作“林下之游”，还各自取了别号，王若虚号慵夫，彭悦号澹子，王权号狂生，周嗣明号放翁，“曰澹，曰慵，曰狂，曰放，世以为怪，而自谓其真”^⑧。这是寓居京师向仕途迈进的青年文人群体想象将来退出仕途后的美好生活，但他们都不会想到这一承平梦想并无实现的机会。

总之，在燕京文学空间气象完好的58年间，完颜亮缔造的中都为金代文学的蓬勃生长创设了良好的空间，而中都帝王对汉语文学的热爱和对科举制度的完善，又为这个时代选拔和培养了大批文学人才。依托于不断完善的政治制度、爱好汉文化和汉语文学的帝王及学养深厚的朝廷文官、往来参加科考的四方文士，中都形成了浓厚的文学氛围，也为南渡文学和元初文学积累了丰厚的文学资源。

①[金]赵秉文撰，马振君整理：《赵秉文集》卷七，第179页。

②[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1册，第193页。

③[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6册，第1831页。

④[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6册，第1834页。

⑤[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3册，第972页。

⑥[金]王若虚撰，马振君点校：《王若虚集》，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下册，第573页。

⑦[元]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二，第13页。

⑧[金]王若虚撰，马振君点校：《王若虚集》，下册，第559页。

余论

大安三年(1211)的蒙古入侵改变了金朝的政治生态,也改变了这一年之后中国北方的文学生态。贞祐二年(1214)宣宗迁汴,次年五月中都失陷,“雄丽为古今冠”的中都城“俄为乱兵所焚”^①。完颜亮精心命名的宫阙、楼阁、池沼、花木,帝都林立的酒楼、佛寺,以及有关一个王朝的美好记忆,都随着大火化为灰烬。前文列举的中都作家高廷玉、周昂、周嗣明、梁持胜、李经等人都在战争中去世。周昂、周嗣明参战入伍,死于野狐岭之败;高廷玉因卷入“勤王案”瘐死洛阳狱中(元好问《希颜墓铭》)^②;梁持胜在上京留守判官任上,因不为叛乱的宗室蒲鲜万奴作文移而遇害。梁持胜留在文学史上的最后一首诗是《哀辽东》,“十万人家靡孑遗,马蹄殷染衣冠血。珠玉盈车宫殿焚,娟娟少女嫔羶腥”^③,写尽了战争中百姓的死难和屈辱。曾写有《登悯忠寺阁》的史肃留下的最后一首诗是长达36句的七古《哀王旦》,铺叙同年王晦在对蒙战争中的英雄史绩,写得悲壮激烈,荡气回肠。史肃喜欢佛学,元好问说他“作诗精致有理”,《中州集》所收诗歌多为五七言近体,且多充满禅机理趣;但在时变激荡下,五七言近体的体制已不能容纳诗人内心的激烈悲慨之气,必得用这样的长篇伟制一抒胸中长歌当哭之气。史肃在任同知汾州事时卒于任,元好问感叹“可哀也”^④。

当然这一时期文学史最为重要的转关,是赵秉文诗风的变化。赵秉文在章宗时期多写应制诗,卫绍王初出任宁边州刺史、平定州刺史近两年时间里,所创作的《环翠楼》《涌云楼雨二绝》《涌云楼雨》《重午游冠山寺》等诗呈现出明显仿拟“诚斋体”的特点,如“片云头上一声雷,欲到冠山风引回。窗外忽传林叶响,坐看飞雨入楼来”(《涌云楼雨二绝》)^⑤,活泼生动,轻美俏皮。大安三年(1211)战事突起后被召回朝廷,开始了与国家命运同脉共振的最后21年。贞祐元年(1214)中都被围期间,省掾田琢自请出城募兵,时任兵部郎中的赵秉文作《从军行送田琢器之》诗为之壮行。诗歌为七言古体,32句224字,历数蒙古军队入侵后百姓的惨状,飞鸟不渡,行人断绝,长安燃脐火,山东海水红,对保卫中都的文人田琢、李英、侯挚、王晦等大为称扬,“横遮俘户三千万,潼关大笑哥舒翰。三书慷慨请长缨,临风铙翻空三叹”^⑥,勉励他们保家卫国、建功立业。家国之难与职务所系,使他作为“国笔”的地位至此开始凸显。而以此次回朝为界,他个人的诗风、文风、文学理念都发生了重要转变,并随着他在文坛地位的稳固和提升,对金末文学的整体风貌甚至元初文学都发生了重要影响。

颇有趣味的是,金元之际最为重要的作家元好问于大安元年(1209)赴中都参加省试不捷,写下了他与中都发生关联的第一首诗《出京》:“巫峡归云底处寻,高城渺渺暮烟沉。春风不剪垂杨断,系尽行人北望心。”^⑦一位落第才子满怀惆怅地出京返乡,回身看到京都高城渺渺、暮霭沉沉,离自己越来越远;而春风剪不断帝都那些垂杨,有多少行人此时都在向北顾望啊。忻州在中都之南,“北望”也即望帝都,望前程,望那种难以企及的繁华。此次进京,元好问登临了中都南楼,国亡后,他回忆这次短暂的中都之行说:“予二十许时,自燕都试,乃与客登南楼。”(《两山行记》)^⑧中都也在他生命中刻下了深刻的烙印,再次回来时

①[清]李有棠撰,崔文印点校:《金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791页。

②[元]元好问撰,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上册,第215页。

③薛瑞兆编撰:《新编全金诗》,第2册,第920页。

④[元]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4册,第1179页。

⑤[金]赵秉文撰,马振君整理:《赵秉文集》卷八,第226页。关于赵秉文对诚斋体的悄然模仿,可参看胡传志:《论诚斋体在金代的际遇》,《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⑥[金]赵秉文撰,马振君整理:《赵秉文集》卷四,第81页。

⑦[元]元好问撰,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第1册,第8页。

⑧[元]元好问撰,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中册,第804页。

已是二十余年之后，中都已不再叫中都，沧桑巨变，物是人非。^①而更意味的是，正是在中都盛世即将画上句号的1211年前，元初重要文人魏璠（1201）、王磐（1202）、史天泽（1202）、刘祁（1203）、姚枢（1203）、李昶（1203）、孟攀鳞（1204）、徐世隆（1206）、高鸣（1209）、许衡（1209）、商挺（1209）、刘德渊（1209）等人相继出生，即将在战乱流离中度过他们的童年，并在30年后成为易代之际文化救亡的先驱。

Zhongdu of Jin Dynasty and the Prosperous Style of Jin Dynasty Literature

ZHANG Yong-yao

(Chinese Poetics Research Center,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relocation of the capital to Beijing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golden age of the Jin Dynas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Beijing's literary history from regional literature to imperial literature. Relying on the constantly improving political system, emperors who love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highly educated court officials, and scholars from all direction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ll of China has transformed from a geographical space into a literary space where multiple ethnic literati blend and interact. Palace buildings, markets, temples, bridges, and other places have become the objects of literati's writing, and literati's writing is also shaping these spaces. The same collection of poems by literati on snow, peonies, and lotus reflects the prosperous era of the Jin Dynasty, and the central urban space also presents literati with an elegant and peaceful style in their creations. The writers of Zhongdu, as well as their creative practices and literary ideas, hav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literary circles of Nandu and the early Yuan Dynasty.

Key Words: Zhongdu of Jin Dynasty; Writing in a prosperous era; Literary space

[责任编辑 唐音]

^① 参看张勇耀：《金元之际的燕京书写及其文化空间的意义重构》，《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